

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的史学价值

崔磊¹, 雷家宏²

(1 铜陵学院 法政系, 安徽 铜陵 244000; 2 华中科技大学 历史研究所, 湖北 武汉 430074)

摘要: 陈寿《三国志》和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并行流行于世, 由于《三国志》过于简略的缘故, 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作注, 广征博引, 补充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史料。裴松之的注开创了史注新的研究范式, 发展了历史考证法,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关键词: 裴松之; 《三国志》; 《三国志注》; 历史考证法

中图分类号: K236 **文献标志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9-2854(2011)03-0010-04

陈寿的《三国志》是依据当时官修的史书——王沈《魏书》、韦昭《吴书》和私撰史书——鱼豢《魏略》以及他直接采集资料, 完成《蜀书》后, 与《魏》、《吴》两书并列而撰成的。“总的来说, 因为陈寿见到的史料有限, 所以三书的内容都还不够充实。”但“寿书铨叙可观, 事多审正。诚游览之苑囿, 近世之嘉史。然失在于略, 时有所脱漏。”于是裴松之奉宋文帝之命为《三国志》作注。^[1]

历来学者对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(以下简称裴注)的价值褒贬不一。胡应麟对之深加赞赏:“裴松之之注《三国》也, 刘孝标之注《世说》也, 偏记杂谈, 旁收博采, 迨今借以传焉。非直有功二氏, 亦大有造诸家乎! 若其综核精严, 缴驳平允, 允则史之忠臣, 古之益友也。”^[2]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裴注的评价较为全面:“然网罗繁富, 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, 尚一一见其崖略; 又多首尾完具, 不似酈道元《水经注》、李善《文选注》皆翦裁割裂之文, 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, 转相引据者, 反多于陈寿本书焉。”^[3]贬之者如刘知几认为:“少期集注国志, 以广承祚所遗, 而喜聚异同, 不加判定, 恣其击难, 坐长烦芜。观其书成表献, 自比蜜蜂兼采, 但甘苦不分, 难以味同萍实者矣。”^[4]陈振孙也说:“松之在元嘉时承诏为之注, 鸠集传记, 增广异闻。大抵本书固率略, 而注又繁芜。”^[5]今天看来, 二人观点不免有些偏颇。

裴注的缺点毋庸讳言, 但也不可因此而否定裴注的价值。裴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《三国志》简略的缺陷, 使人们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, 更加全面地了解三国史。《三国志》和《三国志注》相得益彰不可分离。瞿林东先生说, 二者“离则两伤, 合则两美”。

一、裴注补充了大量历史史料

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作注, 广搜资料, 精心撰写, 所引书目数量大, 内容繁富, 足见裴氏用功之勤。关于本书的体例和性质,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四十五史部正史类说:“宋元嘉中, 裴松之受诏为注, 所注杂引诸书, 亦时下己意。综其大致, 约有六端: 一曰引诸家之论, 以辨是非; 一曰参诸书之说, 以核讹异; 一曰传所有之事, 详其委曲; 一曰传所无之事, 补其阙佚; 一曰传所有之人, 详其生平; 一曰传所无之人, 附以同类。”^[3]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裴松之的学术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。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作注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有感于《三国志》之“失之于略, 时有所脱漏”。从这一点出发, 我们便可确定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的主要方法在于补阙拾遗, 补充大量史料, 使《三国志》的内容更加丰富详实。

首先, 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补充了大量的人物。《三国志》有许多人物并无记载, 引述各书补充其生平事迹。在《三国志·魏书》注中, 裴松之引鱼豢《魏略》、《典略》、《华阳国志》、《楚国先贤传》等书补充了孔桂、张特、焦先、贾洪、时苗、严干、韩宣、黄郎、孟他、应余、金元休、马钧等等众多人物。在《蜀书》注中补充

收稿日期: 2011-02-17 修订日期: 2011-03-18

作者简介: 崔磊(1982—), 男, 安徽萧县人, 铜陵学院法政系讲师, 主要研究方向: 中国文化史;

雷家宏(1963—), 男, 湖北随州人,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, 硕士研究生导师, 研究方向: 中国文化史。

了文立、譙秀、李密、常播、卫继等等。在《吴书》注中引《江表传》、《吴录》、韦昭《吴书》等补充了高岱、于古、陈化、朱育、贺循等等。

《三国志》记载有些人物不详的,裴松之就引述其他书内容,补充人物的主要事迹及主要历史背景、史实。《三国志》对曹操的出身及少年事迹的记载语焉不详,裴松之就引述了王沈《魏书》、吴人作的《曹瞒传》、司马彪《续汉书》补充了大量史实,使人们对曹操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。关于赤壁之战,陈寿《三国志·魏书》中只有寥寥的一些字:“公至赤壁,与备战,不利。於是大疫,吏士多死者,乃引军还。备遂有荆州、江南诸郡。”裴松之在注解中就引述了《山阳公载记》、孙盛《杂同评》、在《蜀书》和《吴书》注中引述了江表传对赤壁之战前后各方的准备、谋划及具体经过都作了详尽的记载,使人们可以深刻地了解赤壁之战的全貌。《魏书·袁绍传》载:“绍爱少子尚,貌美,欲以为后而未显。”对袁尚受袁绍宠爱,后来未显的事实记载简略。裴松之注引《典论》曰:“谭长而惠,尚少而美。绍妻刘氏爱尚,数称其才,绍亦奇其貌,欲以为后,未显而绍死。刘氏性酷妒,绍死,僵尸未殡,宠妾五人,刘尽杀之。以为死者有知,当复见绍於地下,乃髡头墨面以毁其形。尚又为尽杀死者之家。”诸如此类不胜枚举。

其次,裴松之补充了大量边疆各族及西方各国的史料。在边疆西北、西方各族各国情况方面,陈寿《三国志》只是在《乌丸传》、《鲜卑传》、《东夷传》中简略带过,裴注引《魏略·西戎传》对匈奴、氐、羌、西域诸国、大秦及大秦属国作了补充记载,特别详细地叙述了大秦的地理、交通、风俗、物产等情况,为后人研究当时少数民族及外国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。

再次,裴松之还对不同史料进行考异。裴松之将所搜集的资料一一摘录,供读者参考研究,使读者各取所需。如《魏书·三少帝纪》记载:“甘露五年己丑,高贵乡公卒,年二十。”仅仅叙述高贵乡公的死,至于死因、经过都未提及。裴注就征引《汉晋春秋》、《魏晋世语》、《晋诸公赞》、干宝《晋纪》、《魏氏春秋》、《魏末传》等书详尽叙述了高贵乡公被弑的原因、经过,各书记载基本一致,略有不同。孰是孰非,由读者自作决断。《蜀书·先主传》载,曹操官渡之战大破袁绍之后,“自南击先主。先主遣麋竺、孙乾与刘表相闻,表自郊迎,以上宾礼待之,益其兵,使屯新野。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,表疑其心,阴御之。”刘表与刘备相处情况不详,裴注引司马彪《九州春秋》、《世语》、孙盛《魏氏春秋》内容,将不同说法记录于此,备读者参考。

最后,裴松之对《三国志》讹误之处进行纠正。《魏书·武帝纪》载:建安八年“冬十月,到黎阳,为子整与谭结婚。”裴松之根据当时的礼法,认为此处错误:“绍死至此,过周五月耳。谭虽出后其伯,不为绍服三年,而於再期之内以行吉礼,悖矣。魏武或以权宜与之约言;今云结婚,未必便以此年成礼。”《魏书·明帝纪》载“青龙三年,帝崩于嘉福殿,时年三十六。”裴松之认为此处有误,经考证,认为明帝死时应三十四岁。《吴书·三嗣主传》载“五年,皓死于洛阳。”裴松之认为,孙皓的卒年应为西晋太康四年十二月。裴松之根据事实、礼法等进行判断,结论可信。

由于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引书丰富,数量远远大于《三国志》本书,不仅为《三国志》本身补充了大量的史料,使三国史事更加丰富、完整,而且他所引书中绝大多数今天已散佚,赖其方得以保存,以此尤见其珍贵之所在,故后世考据家多依赖裴注。由于《三国志注》具有如此显著的特点,所以裴松之上呈宋文帝后,“上善之,曰:‘此不朽矣’”。宋文帝对该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,直指本质。

二、裴注开创了史注新的研究范式

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有重要的价值。在裴松之以前,先秦为《春秋》作注的就有《春秋三传》;汉代有马融、郑玄为《尚书》作注,贾逵、杜预注《左传》,徐广注《史记》,服虔、应劭、韦昭注《汉书》。这些注只是注原文的音义、名物、地理、典故等。至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体例大变,裴注更注重的是补充史实,列举考异,考辨真伪,史注中融入个人情感,开创了史注新的研究范式。至于裴注形成的原因,陈寅恪认为是受到了佛教“合本子注”的影响,在《读〈洛阳伽蓝记〉书后》一文中说:“裴松之《三国志》注,人所习读,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。”^[6]

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作注,采用的方式是以史注史,就是广泛地阅读征引各方面史料。正如他在《上三国志注表》中所说:“窃惟续事以众色成文,蜜蜂以兼采为味,故能使绚素有章,甘逾本质。”在此思想的指

导下,裴松之大量征引各书,征引的数量之大、门类之广,史无前例。在注中,内容概括起来可分为:一是注音义、典故、地理;二是补充内容和缺漏;三是补充考证史料;四是列出各家对史料和历史事实的见解和评论;五是对其他史学家的批评。裴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《三国志》的不足,使志与注相得益彰。裴注借鉴、吸收前人成果,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,使注可以容纳更多内容,开创了史注的新的研究范式。

裴注使用的主要注释形式有:一为引文,主要以《*》曰、《*》云、《*》载等形式;二为按语,裴松之在引文前后经常添加按语,以简述引文的由来或引文所叙人物的情况;三为释文,对《三国志》中疑难的字音地名典故等作解释;四为考证,以案的形式进行考证;五为评论,裴氏有时亲自评论,有时引用他人的评论,如:刁凿齿、孙盛等人的评论。

三、裴注发展了历史考证法

考证法是中国传统史学最主要的方法之一。在裴松之以前,司马迁、班固在从事创作时,虽没有明确的记载表明他们采用了考证法,但他们也一定会对各种不同的史料进行认真的考证。蜀人譙周有《古史考》,西晋司马彪对《古史考》进行考辨,他们明确采用了考证法,孙盛的《异同杂语》中也有一部分对史料进行考证,惜其皆佚。裴松之必定会受到他们的影响,他在作注时,关于三国时期的史书非常丰富,各种记载迥异,错误歧异在所难免。正如他在《上三国志注表》中所说:“按三国虽历年不远,而事关汉、晋。首尾所涉,出入百载。注记纷错,每多舛互。”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家,裴松之对此不能置之不理,必须予以认真的校对、订正,考辨史实。

根据各种文献记载进行考证。一是依据其他史书考证《三国志》原文的错误。如《魏书三少帝纪》载:“镇东将军母丘俭、扬州刺史文钦反。大将军司马景王征之。闰月己亥,破钦于乐嘉。钦遁走,遂奔吴。都尉斩俭,传首京都。”裴注引《世语》曰:“大将军奉天子征俭,至项;俭既破,天子先还。”裴松之遍览群书,发现天子并未与景王一同征伐,因而否定了《世语》的记载。《蜀书·诸葛亮传》注中对空城计史实进行考证,根据诸葛亮与司马懿的活动而否定其真实性。《魏书·荀彧传》注中对荀彧父荀緄幕中常侍唐衡之势,为荀彧娶唐衡之女之事,根据年龄考证予以否定。《蜀书·向朗传》载:“朗自去长史,优游无事垂三十年。”裴松之考证说:“朗坐马谡免长史,则建兴六年中也。朗至延熙十年卒,整二十年耳,此云‘三十年’,字之误也。”二是以《三国志》考证其他史书的错误。《魏书·袁张凉国田王邴管传》注引《傅子》曰:“太祖既诛袁谭,梟其首,令曰:‘敢哭之者戮及妻子。’於是王叔治、田子泰相谓曰:‘生受辟命,亡而不哭,非义也。畏死忘义,何以立世?’遂造其首而哭之,哀动三军。”裴松之根据《魏书·田畴传》“畴为袁尚所辟,不被谭命”的记载,判断哭袁谭的仅王彧一人,《傅子》合而言之,有违事实。

裴松之还根据实地调研资料或别人的调查结果进行考证。干宝《搜神记》“及明帝立,诏三公曰:‘先帝昔著《典论》不朽之格言。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,与石经并,以永示来世。’”裴松之曰“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,历观旧物……非两处立也。”裴松之对《搜神记》中如此细微错误都不放过,足见裴氏治学态度之严谨。《蜀书·诸葛亮传》注引《魏略》“庶后数年卒,有碑在彭城,今犹存焉。”此处所记,乃裴氏亲眼所见的确切事实。

对于缺少文献和调查材料无法考证者,裴注则采取存异的方法,或注明未详、未详孰是、未详其故,此语与本传不同、此语与某某所说不同等等。如《三国演义》中曹操说“宁教我负天下人,休教天下人负我”,实际上此事《三国志》无记载,来自裴松之的注文,此事是裴松之在《魏志·武帝纪注》中分取了王沈《魏书》、郭颁《魏晋世语》和孙盛《杂记》三种不同的记载以存异的方法出现的。对无法考证的史实,裴松之进行了全面精细的考证,广征博引,从材料之间的关系及当时的礼法实际情况着手考证,得出了令人信服结论。

《三国志注》与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、唐李善的《文选注》、南朝梁的刘孝标《世说新语注》并称为“四大名注”,更居于四大名注之首。一言而括之,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在中国史学史和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,该书的撰写是对魏、晋时期的史学发展的一次总结性研究,由其发展,以“存异”、“纠谬”为特征的历史考证方法,特别是将考证注入史注之中的方法,对后代的历史编纂学和中国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(下转第 31 页)

(上接第 12页)

参考文献:

- [1] 陈 寿.三国志[M].裴松之,注.北京:中华书局,1959
- [2] 胡应麟.少室山房笔丛[M].上海:中华书局,1958
- [3] 纪 昀.四库全书总目提要[M].上海:中华书局,1966
- [4] 刘知几.史通[M].浦起龙,释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 125.
- [5] 陈振孙.直斋书录解题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 78.
- [6] 陈寅恪.金明馆丛稿二编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 257.

Value of *Commentaries on Standard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* Made by Pei Songzhi

CU I Lei¹, LEI Jia-hong²

(1. Department of Law & Politics, Tongling University, Tongling 244000, China)

2. Institute of History,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, Wuhan 430074, China)

Abstract *Standard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* of Chen Shou and *Commentaries on Standard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* of Pei Songzhi are equal spread to this day. Because of simple narration of Chen, Pei Songzhi annotated it on the basis of thorough reference and valid reasons. The emergence of *Commentaries on Standard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* mark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historiographical annotation, developed the historical textual approach. Exactly in this way, it perfected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s.

Key words Pei Songzhi; *Standard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*; *Commentaries on Standard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*; Historical textual approach

(责任编辑: 陈道斌)